

敦煌文书 P. T. 127《人姓归属五音经》与 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研究^{*}

陈于柱

敦煌藏文本 P. T. 127《人姓归属五音经》，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精英根据汉文本《宅经》改编而成的一部有关姓氏分类的占卜典籍，使用群体主要为吐蕃移民。《人姓归属五音经》的发现，对于解决归义军时期吐蕃移民曾普遍采用汉族姓氏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 P. T. 127，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在面临因“单户”身份导致诸如在地区请占田经济体制中土地耕种权无法保障的困境下，为提升族群社会地位与认同，取得现实生存合法性，对族群文化进行重塑的产物。P. T. 127 这类看似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本，其实隐喻着吐蕃移民如何利用地方秩序语言，在区域社会中以提升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的族群历史变迁。因此弥足珍贵，甚堪关注。

关键词：敦煌文书 《人姓归属五音经》 归义军时期 吐蕃移民

作者陈于柱，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48。

一、P. T. 127 文本概况

法藏敦煌藏文写卷 P. T. 127，主要由占卜卜辞与吐蕃医方等内容构成。学术界对其医学价值研究较早、极为深入，对卷中占卜术数内容的关注则始于麦克唐纳夫人的早期探讨，^①此后山口瑞凤、^②王尧、^③高田时雄诸位学者相继有介绍和说明，其中尤以高田氏为详：“这一写本全体的构成说明如下。第〔I〕部分：表面 ll. 1- 77 为 1 年按月份记载吉凶的占书。第〔II〕部分：接下来的 ll. 78- 184 为被称作《火灸疗法》的医学文献。第〔III〕部分：背面的 ll. 1- 9 为干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0ZD080)，“天水师范学院‘青蓝’人才工程基金”阶段性成果。

① See Macdonald, Une Lecture des P. T. 1286, 1287, 1038, 1047 et 1290, in Etudes Tibétaines, Adrien Maisonneuve Publishers, 1971, p. 284. 中文论著参见[法]A·麦克唐纳著、耿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6、157 页。

② 参见山口瑞凤主编：《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9、540 页。

③ 参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26 页。

支表。第〔IV〕部分: II. 10-14 为五行的配合表。这一段文字简短,且与下文提到的五姓文书密切相关……第〔V〕部分: II. 15-28 即下文所要讨论的《人姓五音归属经》。第〔VI〕部分: 继此之后的 II. 29-77, 仍为与最初文书相似的占书。”^①所谓按月份记载吉凶的占书,通过罗秉芬、刘英华以及笔者的研究,^②已确认是根据汉文本禄命书改编而成的《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因此, P. T. 127 正背面分别抄写的是《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火灸疗法》、干支表、五行表和《人姓归属五音经》。本文重点探讨的《人姓归属五音经》,时至目前仅高田时雄于上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作过释录和研究,^③此后未能引起学界足够关注。高田氏对 P. T. 127 的释录极大增进了学界对敦煌藏文占卜文献的认识,其功甚巨,但在《人姓归属五音经》使用群体等问题上,笔者认为仍有可商的余地。此外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 P. T. 127, 对于深度解读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亦需做进一步探讨。

二、《人姓归属五音经》的文本属性

《人姓归属五音经》,其实是高田先生对 P. T. 127 背面第 15-28 行相关书写的一种简称,其汉译文如下:

人之姓氏归属于五音之中的经。宫姓在土行,汜,范,□,阎,任,严,刘,郑,宋,□,孙,□,牛,游,宫,□,曲,□,牢,仇,舍,□,□,□,□,□等等,属土行。

商姓在五行,张,王,梁,唐,阳,索,常,贺,荆,□,左,□,姚,杜,康,□,桑,□,□,令狐,庆,蒋,石,安,卢,□,□,郝,藉,□,傅,罗,仕,向,□,马,雷,□,□,扈,□,□,□,□,□等等姓属五行。

角姓在木行,龙,翟,朱,窦,□,侯,□,孔,原,赵,巢,曹,乐,周,□,姚,左,牛,屈,□,沙,□等姓属角。

羽(徵?)姓在火行,李,史,陈,田,郭,郑,贾,□,申,宁,段,□,伊,儿,□,薛,□,□,□,□等姓属火行。

羽姓在水行,□,鲁,□,马,孟,贾,□,黄,□,平,□,武,温,胡,□,苏,□,表,□,□,□等姓是水行。^④

所谓“人之姓氏归属于五音之中的经”,主要叙述各类姓氏的五音(宫、商、角、徵、羽)归属,此类书写在中国古代术数文化中被习称为“五姓”。五姓、五音均为传统五行说之一环,在汉至宋的多类占卜选择术中被长期广泛使用。^⑤五姓各自包含的姓氏究竟有哪些?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随着时代变迁和术数文本的不同,其姓氏归属也会有所变化,甚至出现不确定和相互矛盾的现象。唐初吕才就曾批评道:“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⑥该种情况在敦煌占卜文献中也是屡见不鲜。敦煌占卜文献涉及五姓姓氏的主要有葬书和宅经,就前者而言, P. 3647《葬书(拟)》残存有羽音所包括的姓氏及相关说明:

① [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52—353 页。

② 参见罗秉芬、刘英华:《敦煌本十二生肖命相文书藏汉文比较研究——透过十二生肖命相文书看汉藏文化的交融》,《安多研究》第 2 辑,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7 页;陈于柱:《敦煌藏文本禄命书 P. T. 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再研究》,《中国藏学》2009 年第 1 期。

③ 参见[日]高田时雄:《五姓说在敦煌藏族》,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56—767 页;[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第 352—353 页。

④ [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第 339—341 页。

⑤ 参见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7—93 页。

⑥ 《旧唐书》卷 79《吕才传》。

武,许,吕,傅一云商,余,郎,马,于,韦,作,褚,吴,卫,郭,臣,虞,郇,扈,袁一云商,辅,俱,固,温一云官,蒲,步,祖一云商,云一云商、一云徵,睦一云商,骨一云商,霍一云角,母,定五姓。右前五姓,皆依五音韵之,或胡改突之姓,音虽各别,皆为商用者,为上代是复姓,属商。或因继嗣他宗,亦取本姓为用,但复姓皆从商姓为定,仍任本姓所属用之。^①

敦煌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的羽姓与 P. 3647《葬书(拟)》相比较,虽有个别姓氏相同,但在数量及顺序上,两者相差甚巨,表明《人姓归属五音经》并非来自《葬书》系统。

关涉五姓姓氏的敦煌写本宅经主要有 P. 2615a, P. 2632v, x01396+ 01404+ 01407v, 其中 P. 2615a 保存内容最为完整。高田时雄先生曾敏锐地指出,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商姓起始部分“张,王,梁,唐,阳,索,常”与角姓起始部分“龙,翟,朱,奚”,以及徵姓起始部分“李,史,陈,田”均与 P. 2615a 一致,进而认为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与 P. 2615a《宅经》有较近的关系。^② 笔者对此甚是认同。可以进一步补充证明的是, P. 2615a《宅经》有些姓氏重复出现在五姓之中的现象同样也表现于藏文本中,而且其顺序亦有相近之处,如 P. 2615a 角姓下的“姚”、“左”,又在商姓中以先“左”、后“姚”的方式出现,《人姓归属五音经》与之完全相同; P. 2615a 徵姓下的“贾”,重复出现于羽姓中,《人姓归属五音经》亦然。由此似可认定,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应当属于《宅经》所载五姓的一个缩略本,换句话说,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极有可能改编自汉文本《宅经》一类的占卜典籍。

三、《人姓归属五音经》的抄写时间与使用群体

关于《人姓归属五音经》的抄写时间,高田时雄先生从语言史的角度将其考定为 10 世纪写本。^③ 笔者根据 P. T. 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主要依据汉文本 P. 3398 改编而成情形,并鉴于 P. 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为归义军时期敦煌三界寺法律所抄,同样认为 P. T. 127 应属归义军时期写本。^④ 因此将敦煌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的抄写时间界定在归义军时期,已属共识。

关于《人姓归属五音经》的使用群体问题,高田时雄最早认为“上举的藏文五姓材料使我们断定,到了 10 世纪敦煌的藏族受邻居汉族的影响而采用了这个迷信思想”。^⑤ 但后来又提出“仅仅因为在 10 世纪的敦煌存在着纯粹的藏人社会集团,就断定诸如以五姓说为首的汉俗被这些人所采用,可以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⑥ 言外之意《人姓归属五音经》的使用人群应是受吐蕃文化影响、操持吐蕃语的汉人。观点的转变并非毫无道理,除高田先生提供的既有证据外,敦煌藏文本 P. T. 1089 谈到吐蕃统治下的沙州汉人官吏时就有“唐人悉编张悉诺律”,以及“任唐人为官吏者:派杜悉诺结为唐人都督及吐蕃节儿僚佐……任命张悉诺腊为水利官,兼一部落长官;……任命樊悉诺士为度支官”,^⑦ 均说明在吐蕃统治时期确有相当一批吐蕃统治者眼中的“唐人”,采用了“汉姓吐蕃名”的姓名方式,而这种方式也是有可能在归义军时期继续沿

① 录文图版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4 页。

② 参见[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第 343 页。

③ 参见[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第 345、346 页。

④ 参见陈于柱:《敦煌藏文本禄命书 P. T. 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再研究》,《中国藏学》2009 年第 1 期。

⑤ [日]高田时雄:《五姓说在敦煌藏族》,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 766 页。

⑥ [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第 348 页。

⑦ 王尧:《西藏文史探微集·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9-94 页。

用的。不过笔者认为,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的使用群体问题,应放置在 P. T. 127 文本的整体语境中考察,方能最终明了。

前文言及 P. 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禄命书的内容构成非常特殊,即前半段的占辞是按照“属相(生肖)一命属一日料一宜忌”的程式展开,而后半段的占辞却增添了北斗七星、本属相人的来历及性情、寿命等新的事项。^①鉴于这种不对称的占卜模式在中国古代术中极为罕见,且从问卜者的角度考虑,如果把中土之人说成前世本是“安国”、“摩伽国”、“天阗罗国”、“叶波国”、“波提国”的异族,对于有着强烈宗族郡望意识的汉族来讲,显然是难以接受的。故笔者认为 P. 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后半段应是叠合了另一部禄命书《七星人命属法》的占辞,其目的是要利用北斗“注死回生”与佛教轮回转生宗教功能的一致性,适时地将流寓敦煌地区的胡族命属导引在中国传统的生肖、五帝之下,从而为胡、汉信众提供原则一致的禄命咨询。这种占卜体系当为混居在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汉族、吐蕃、粟特等族群所普遍接受。^②藏文本 P. T. 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刊布,^③有力地证实了笔者的这一观点。仔细研读 P. T. 127,可以看出藏文本在结构逻辑上体现着对 P. 3398 强烈的继承与扩展,通篇与 P. 3398 后半段的模式基本一致,以羊(未)生人为例:

羊年生人,北斗七星中有“郭囊僧旺”星,即南方赤帝之子,前世于东方之东普其果修成神法,但半夜被打乱,故降生羊年;命相属热达先星之鳖(乌龟,即玄武)腹下,俸粮每日豌豆半克,衣着及服药宜红色;不施大毒计,傲慢,面临危险,灾害将至;十九岁、三十三岁有大厄,如那时不死,可活到九十九岁,最终五子成器;羊牛不合,季夏月、季冬月不宜探病与吊唁。

P. T. 127 虽以 P. 3398 为底本,但除在结构上加以扩展外,对其占辞内容也作了相应的改造,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以下两点:一是命粮的重量改用蕃克、蕃升为单位;^④二是命相人的前世来源地由 P. 3398 中的“安国”、“摩伽国”、“天阗罗国”、“叶波国”、“波提国”,变作“基涅”、“素严之地”、“东方哈果桑之地”、“丝木切”、“东方之东普其果”、“亚国”、“琦夏国”。

首先需要注意, P. T. 127 禄命书中的计量单位是蕃克、蕃升。尚在吐蕃统治时期,分处于各部落下的敦煌汉人仍坚持以汉硕、汉斗为计量单位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如敦煌藏文本 P. T. 1297《宁宗部落夏孜孜永寿寺便麦契》记载:“宁宗部落之夏孜孜因无种子及口粮,濒于贫困危殆,从永寿寺三宝与十方粮中,商借麦及青稞八汉硕。”^⑤P. 4686《悉董萨部落百姓孙清便粟契》:“二月二十三日,悉董萨部落百姓孙清为无粮用,今于永寿寺僧便佛物汉斗叁硕。”^⑥敦煌光复之初,中原使者叹念“沙州一地,人物风华,一同内地”,^⑦应非虚言。到了归义军时期,即

① 以未生人为例:“未生羊相人,命属武曲星,西南方黄帝子,日食大豆一石二斗一升,宜着黄衣,有病宜服黄药,大厄丑未之年,小厄六月十二月,忌吊死问病。秋冬生富贵,春夏生自如。四子上相,三子力。其人本是安国人,前世为破斋,遂来至此生。为人信敬、敦厚、文章,宜为史,奴婢六畜足用。三十保财,年二十官厄,君子得官位,三十五中厄,四十五大厄,得度,受命八十一。一生不得向西南方大小便,慎之大吉。”

② 参见陈于柱:《占卜·佛道·族群——敦煌写本禄命书 P. 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9—211 页。

③ 敦煌藏文本《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目前已知有两件,除 P. T. 127 外,还有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斯坦因敦煌藏文写卷 ch. 80. IV. h。参见陈于柱:《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197 页。

④ 如“鸡年生人,(上天)命相属 迦囊僧旺 星宿,即西方白大帝之子,前世作恶一偷盗,如今降生鸡年;命属 天辛辛吉 辛康 即 瓦素 之下;俸粮每日小麦五蕃升”。

⑤ 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 页。

⑥ 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第 11 页。

⑦ 王重民编:《敦煌变文集》上册“张淮深变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4 页。

便是辖区内的吐谷浑人也已多习用汉斗、汉硕。^①P. T. 127 的使用群体如果是汉人的话,很难想象在 10 世纪的敦煌会以蕃克、蕃升作为计量单位,因此这种可能性甚小。其次,考虑到 P. T. 127 禄命书对汉文本改编的第二点内容,P. T. 127 的使用与信仰群体可以进一步确定为生活在敦煌地区的吐蕃人。如果说汉人社群对 P. 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所言前世本为“安国”、“摩伽国”等域外之人的说法难以接受的话,那么同样对 P. T. 127 禄命书所谓前世为“丝木切”、“东方之东普其果”、“亚国”、“琦夏国”等地之人同样也无法认可,因为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族群体依旧“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②更何况是在 10 世纪的归义军时期。敦煌汉族社群族源观念的牢固性还可由业已吐蕃化的某些汉人个案得到证明,P. 3257《后晋开运二年(945 年)十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押衙王文通牒及有关文书》载:

都押衙王文通 右奉判,付文通堪寻陈状寡妇阿龙及取地侄索佛奴,据状词理,细与询问申上者。问得侄索佛奴称,先有亲叔索进君幼小落贼,已经年载,并不承忘,地水屋舍,并总支分已讫。其叔进君贼中偷马两匹,忽遇至府官中纳马一匹。当时恩赐马贾(价),得麦粟壹拾硕,立机牒五匹,官布五匹。又请得索义成口分地二十二亩,进君作户生(主)名,佃种得一两秋来。其叔久居部族,不乐苦地,却向南山为活。其地佛奴承受,今经一十余年,更无别人论说。其义成瓜州致死,今男幸通及阿婆论此地者,不知何理。伏请 处分。^③

案卷中的索进君自幼落贼,其地南山,位于敦煌南部的祁连山一带。据学界研究,南山部族为一支由吐蕃、吐谷浑及汉人等多民族聚合之游牧群体。从“久居部族,不乐苦地,却向南山为活”来看,自幼落贼的索进君在南山已生活很久,蕃化甚深。即使如此,索进君“已经年载”后仍然能够回到沙州寻根认亲,由此可窥敦煌汉族社群的族源观念一般是不会轻易趋向异域和异族的。

再则,P. T. 127 中的《火灸疗法》,学界已无异议地将其认定为吐蕃医药文献。卷中专门谈到“本外科手术疗法医方,并非出自库藏,是在搜集所有医方的基础上,再结合象雄的疗法而写成”。^④所谓“库藏”,是指由吐蕃官方组织翻译或编著而成,并加以统一收藏的藏医药典籍。^⑤文本之所以申明此疗法“并非出自库藏”,大概是因为 10 世纪的敦煌业已脱离吐蕃统治体系的缘故。但“结合象雄的疗法而写成”的言语,无疑又在强调该疗法的吐蕃特色,《火灸疗法》对病患处的描述如“于耳翼向上量三指到头发之间可摸到青稞大小一疙瘩”、对病因的介绍如“因投掷套绳牵伤肩胛骨”等等,无不是这一特色的具体展示。因此,从《火灸疗法》来看,P. T. 127 的使用者同样也更符合吐蕃群体。

客观来讲,仅仅依据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自身,是殊难准确判定其具体使用者的,但当把考量的视角扩展于 P. T. 127 整体,无论是从习用的计量单位,还是从对信仰者自身来历亦真亦幻式地描述,以及文本所阐述的医疗法,无不表明 P. T. 127 主要服务于吐蕃人这一特定群体。因此,作为 P. T. 127 构成之一的《人姓归属五音经》,其针对的使用者必然也主要为吐蕃社群。

① 如 S. 8443《甲辰年-丁末年(944-947 年?)李闾梨出便黄麻麦名目》记载乙巳年“慕容略罗便黄麻二斗,至秋三斗”,丁末年“退浑慕容略罗便麦肆硕五斗,秋陆硕柒斗伍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年版,第 217、219 页。

② 《新唐书》卷 216《吐蕃传下》。

③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第 296-297 页。

④ 罗秉芬主编:《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 页。

⑤ 参见罗秉芬主编:《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第 39 页。

四、P. T. 127 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

自公元 786 年吐蕃攻陷敦煌, 至 848 年张议潮率众起义, 敦煌地区受吐蕃政权管辖达半个多世纪。归义军政权建立后的敦煌地区是否还存在吐蕃移民? 就此问题, 汤开建、高田时雄、郑炳林等学者均给予了肯定回答。但在各自研究中, 针对敦煌文献见载的大量采用“汉姓蕃名”之人, 究竟是汉人还是吐蕃人, 其意见并不统一。如汤开建先生认为这类人群更大可能是保持汉姓采用吐蕃名的汉人,^①而郑炳林先生认为属于吐蕃移民。笔者认为, 对此类群体虽不宜断然简单地认定为汉人或吐蕃移民, 但为吐蕃社群编纂使用的敦煌藏文本《人姓归属五音经》的出现, 却能够坚实地证明 10 世纪或者说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移民曾经普遍地采用了汉族姓氏; 那么敦煌文献中大量的“汉姓蕃名”之人, 其中也就理应包括为数不少的吐蕃人。

吐蕃本是“俗不言姓, 王族皆曰论, 宦族皆曰尚”。^② 因此不免要问, 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为何要取用汉姓? 或者说吐蕃移民编纂使用《人姓归属五音经》的“意图”何在? 高田时雄先生早期提出的“汉族影响说”虽可作为解释之一, 但除过于疏略外, 更主要囿于从汉文化立场出发, 因此对归义军敦煌吐蕃移民问题难以作“理解之同情”的深入。在笔者看来, 吐蕃移民编纂和使用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 P. T. 127, 与其说是受敦煌地区汉文化影响的被动作为, 毋宁说是吐蕃移民为适应新的生活境况、获取地方社会认同, 而主动采取的族群社会文化建构。

据郑炳林先生介绍, 在敦煌文献 P. 2766v《咸通十二年(871)名册》中, 记载有悉歹勺忠、悉歹勺力、悉歹勺赞等, 并认为属于保留原民族特征的吐蕃人。^③ 这一判断不误的话, 则表明在归义军某些辖区仍有一些不用汉姓的吐蕃人的存在。由此笔者怀疑, 采用汉姓的很可能是那些业已进入敦煌农耕区或汉族社区生活的吐蕃人, 因为社会环境变迁引发区域认同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直接导源于在地区资源共享与竞争中凸显出的族群危机。

随着吐蕃政权在 8 世纪中期对河陇地区的占领, 大批移居到该地区的吐蕃人, 其经济生活形态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普遍由原来的游牧生活向农耕生产、定居生活过渡。为此, 吐蕃政权设“大营田官(zhing pon chen po)”(P. T. 1089)专门管理统治区的农业。^④ 经过半个多世纪, 到归义军时期可以说有相当一批吐蕃移民已完全适应农耕, 很难再回归到原初的游牧境况, 一如 P. 3257 中久居南山的索进君很难再适应敦煌的耕佃生活一样。敦煌本残诗集 P. 2672 描写晚唐凉州: “五柳和风多少年, 琴堂溃毁旧山川。城依峡口当冲要, 地接沙场种水田。经乱不输乡国税, 昔时繁盛起狼烟。夷人相勉耕南亩, 原拜承兑贡上天。”^⑤ 其中“夷人相勉耕南亩”一语正是对河西地区恢复和平后吐蕃移民农耕实态的生动描摹。敦煌地区传统主要以农业为

① 参见汤开建:《对五代宋初河西地区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 汤开建:《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 194,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 年)十一月甲申条。

③ 参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24 页。

④ 参见陈楠:《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与管辖》, 金雅声、束锡红、才让主编:《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27 页。

⑤ 录文图版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7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81 页。

主,兼及少量畜牧业,但因地邻沙漠,其优质土地资源较少,^①所以S.2593《沙州图经》称:“沙州者,古瓜州。其地平川,多沙鹵。人以耕稼为业。”^②P.5007《诗四首》也强调敦煌“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由于敦煌陷落时与吐蕃政权约定“毋徙他境”,因此随着吐蕃军民及其奴部的涌入,敦煌境内有限土地与激增人口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这一矛盾进入归义军时期变得尤为突出。在几宗有关归义军土地纠纷的案件中,以下两则异常引人注目。P.2222b《唐咸通六年(865年)前后僧张智灯状》云:

僧张智灯状,右智灯叔侄等,先蒙尚书造恩,令将鲍壁渠地回入玉关乡赵黑子绝户地永为口分,承料役次。先请之时,亦令乡司寻问实虚,两重判命。其赵黑子地在于涧渠,碱鹵荒渐,佃种不堪。自智灯承后,经今四年,总无言语,车牛人力,不离田畔,沙粪除练,似将堪种。昨通颊言,我先请射,怙恠苗麦,不听判凭,虚效功力,伏望(以下空白)^③

P.3711《唐大顺四年(893年)正月瓜州营田使武安君牒并判词》云:

(前缺)下,乃被通颊董悉,并妄陈文状,请将。伏乞大夫阿郎仁明详察,沙州是本,日夜上州,无处安下,只凭草料,望在父祖(祖)田水,伏请判命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大顺四年正月口日,瓜州营田使武安君系是先祖产业,董悉卑户,则不许入,权且承种,其地内割与外生安君地七亩佃种。十六日勋。^④

第一则所提“尚书”是张议潮,敦煌文献中有确切年份的最晚一件称议潮尚书的文书抄于大中十二年(858)。^⑤根据文状,僧人张智灯大概在大中十二年之前的某一年曾把位于沙州城东的涧渠赵黑子绝户地请射,并细心耕种,岂料四年后突然出现“通颊言,我先请射”之事,于是纠纷顿起。第二则为索勋执掌归义时期,虽距离上一案件近三十年,但原因与性质仍颇相同,瓜州营田使武安君位于沙州的祖田被通颊人董悉“妄陈文状”而得以请占,武安君只好“伏请判命处分”。敦煌在归义军时期主要实施“请占田”的土地制度,无主空荒地即可请射,即使有主的土地如果不缴纳官府赋税差科,可也作为请占的对象。^⑥大概因为此种制度对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并无严格区分或限定,从而使遗留在敦煌的原吐蕃奴部——通颊(mThong khyab)部落,也积极参与到对地区土地资源和耕种权的争夺之中。“通颊”(mThong khyab),原是一种役职部落的名称,它起源于吐蕃本土,其人员主要用于巡逻、守卫等。公元八世纪后半叶,吐蕃攻占唐朝河陇等地后,这种部落建制被援引入被征服的民众中。^⑦敦煌沙州于824年正式出现新通颊千户军部落。归义军政权建立后,一方面把吐蕃编成部落的汉族百姓重新划归乡里,一方面对政权境内吐蕃化较深的通颊和退浑(吐谷浑)人,仍然采用部落的形式加以统治和管理。^⑧所以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称“通颊退浑十部落”。P.2222b《唐咸通六年(865年)前后僧张智灯状》的审判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P.3711《唐大顺四年(893年)正月瓜

① 根据今敦煌市农业局统计,敦煌、寿昌二县,山地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一,平川占百分之八十九,而平川之中沙漠戈壁约占百分之七十二,盐碱斥鹵及河渠湖泊约占百分之十六,耕地面积不到百分之一。参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②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编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③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89页。

④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90页。

⑤ 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⑥ 参见陈国灿:《从归义军受田簿看唐后期的请田制度》,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⑦ 参见杨铭:《通颊考》,《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⑧ 参见荣新江:《通颊考》,杨富学、杨铭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25页。

州营田使武安君牒并判词》将土地判归武安君,规定通颊董悉不许入的情况来看,与张智灯争夺土地的通颊人或部落同样也不会有太大胜算。通颊之所以在土地资源的竞争中失利,究其原因,恐怕关键就在于如 P. 3711 判文中所强调的通颊董悉属于“卑户”一流。另据荣新江先生介绍,抄写于归义军初期的敦煌藏文 P. T. 1080 是关于一个女奴归属的诉讼案卷,文书的结论是把女奴判给比丘尼,而不是作为另一方的通颊女(Thong khyab mo)。P. 3711、P. T. 1080 均表明了通颊人在归义军初期的敦煌社会地位较低的历史事实。

通颊部落民众的境遇,其实也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不仅通颊部落本身就包括有吐蕃人,如谷日·拉匝(甘肃藏卷 Nos. 21, 22)、^①巴若墀,^②而且“通颊退浑十部落”也是归义军政权用来安置和管理吐蕃、退浑等民众的主要行政制度。^③那么归义军时期的吐蕃移民以及吐蕃化的通颊、退浑等族群,如何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与认同度,以应对区域社会的认同危机?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生产发展、建立军功等,固然是一方面,而 P. T. 127 则让我们看到了吐蕃移民通过族群历史文化的重塑来证明自身的一种文化努力。

前文言及敦煌禄命书《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特点之一在于能够为多个族群提供原则一致的禄命咨询,这仅仅是从占卜术数的角度而言。如果换一个视角思量,《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之所以能以汉藏多种语言流行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被多个族群接受,一则此类禄命书不断传达着地区众生平等的理念,因为在这一占卜体系下的每个人都命系于十二生肖、都属五帝之子、都脱离不了北斗“注死回生”与佛教轮回转生的生死轮回。既然如此,那么在此同一信仰体系下的人们也就不再应该存在族群的区隔与社会地位的不同。就藏文本而言,则强烈传递十二生肖、五帝等信仰符号是吐蕃移民与汉族社群共同命属与身份象征的讯息。特点之二在于该禄命书以术数语言的方式申说流寓敦煌的少数民族群体在该地区生存的合法性。如果通读敦煌写真赞,不难发现许多世家大族无不在赞文中不厌其烦地描述自身的族源或郡望,这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一般都接着详细介绍家族是如何来到、并定居敦煌的,其目的不言自明——通过家族的源远流长来证明自身在地区社会的合法性。敦煌少数民族移民显然缺乏类似的历史记忆资源,尤其是移民较晚的吐蕃、吐谷浑等族群。^④不过由于敦煌汉族社群十分流行星命之说,在邈真赞中经常出现之所以成为敦煌人乃是星命所为的习惯说法,如 P. 4638《曹夫人宋氏邈真赞并序》说曹议金夫人“广平鼎族,膺婺宿而诞质河湟”。^⑤这里的婺宿即是二十八宿中的女宿。P. 2991《张灵俊和尚写真赞并序》亦称“和尚俗姓张氏,香号灵俊,清河郡天锡之贵系矣,福星膺胎,隧为敦煌人也。”^⑥所以此种可以规避族群经历、并为敦煌汉族群体所推崇的星命说,无疑为敦煌少数民族移民提供了重写族群历史与文化、证明现实生存合法性的重要契机和文化资本,类似“未生羊相人,命属武曲星,西南方黄帝子……其人本是安国人,前世为破斋,遂来至此生”(P. 3398)、“猪年生人,(命属)‘辛孙’星,北方黑帝子,琦夏国人,前世未能守戒痛惜不已,屈居于曲泰星之下,遂降生于猪年”(P. T. 127)的卜文,即是包括吐蕃移民在

① 参见荣新江:《通颊考》,杨富学、杨铭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第128页。

② 参见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③ 参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第626页。

④ 敦煌粟特人其实也面临相同的困境,不过由于其聚落移民敦煌河西较早,所以有时冒称是敦煌的“氏族豪宗”(P. 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

⑤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⑥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第323页。

内的敦煌少数民族文化精英借助佛教转生之说,以归义军敦煌“违戒”风气为借口,以汉族北斗五帝为最高命属,阐明本族群生存于敦煌地区之缘由与合法性的文化表达。

P. T. 127《人姓归属五音经》是吐蕃移民重塑族群文化的又一重要标志。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汉族势力较强,经常是“大姓雄张”。敦煌地区“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①的观念较为传统和牢固。而以姓氏为基础的“五姓”说在敦煌社会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居住、丧葬、婚姻,甚至社会交际等日常之吉凶宜忌,均讲究于“五姓”。敦煌遗书中就包括了五件《五姓阴阳宅经》和三件《五姓宅经》,涉及“五姓宅图”、“推五姓以定八街吉凶图法”、“五姓安佛堂地法”、“五姓安楼台地”、“五姓安场地法”、“五姓同忌法”、“五姓安门开户法图”、“五姓开井图”、“五姓杂修造日法”、“五姓合阴阳门法”、“五姓合阴阳置仓库法”等诸多生产生活事项,^②归义军粟特裔执政者曹元深,在安葬其父曹议金时即曾遵循于“五姓同忌法”的指导。^③敦煌写本 P. 2534《阴阳书·葬事》规定:“壬寅日,金,定,地下壬申,金鸡鸣玉狗吠,上下不呼。此日葬及殡埋,神灵安宁,宜子孙富贵,大吉昌。起殡、发故、斩草、起土,大吉。角徵二姓用之,凶。”P. 3647《葬书(拟)》强调:“凡人家穴墓田,不问大小倾亩多少,皆有四十九穴,就此之中唯有四穴,五姓相宜,始得安墓,亡人居之,永世安乐。”P. 2830《推人游年八卦图》还提出游年在离“其年之中,与姓姚、侯、吕、董,交通吉”,游年在坤“一年之中宜与姓马、侯……苏、许、吕、郭交忌”,游年在乾“一年之中宜与姓张(后缺)”。当五姓观念早已渗入敦煌社会文化网络之中,内化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记忆形式,并深刻地影响着敦煌汉族社群的文化心理结构、价值认同和行为模式时,吐蕃移民摒弃“俗不言姓”的固有传统,取用汉姓、编写《人姓归属五音经》以确定自身的五姓所属,也就成为该群体融入敦煌社会、获取地方认同的必然抉择。

可以说,P. T. 127 中的《人姓归属五音经》与《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在面临因“卑户”身份导致诸如在地区请占田经济体制中土地耕种权无法保障的困境下,为提升族群社会地位与认同、取得现实生存合法性,对族群文化进行重新建构与型塑的产物。作为流寓敦煌的“无根”族群——吐蕃移民,通过寻找五姓、十二生肖、五帝这样普遍的命运象征符号出来作为认同标志,无疑是扩大认同范围和获取认同的有效手段,使人数不占优势的群体获得极大的精神和心理优势。到10世纪30年代,敦煌通颊部落演变为通颊乡,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应与归义军时期吐蕃移民重塑族群文化的历史进程互为关联。而P. T. 127这类看似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本,其实隐喻着吐蕃移民利用以术数文化为代表的地方秩序语言,在敦煌社会中运用以提升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的区域族群历史变迁,因此弥足珍贵、甚堪关注。

〔责任编辑 贾益〕

① 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323页。

② 参见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第237-276页。

③ 参见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五姓同忌法〉研究——兼与高田时雄先生商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

borderland and ethnic relations were put forward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crisis in the Chinese borderland or ethnic region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deas which connected with management of borderland and their evolution in those suggestions, such as the thoughts on the mimic colonial system and assimil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if researchers return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they should get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ose ideas and their influence.

Key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colonial system; assimilation; management of borderland; ethnic relations.

Five Surnames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Tibetan Immigrants in Dunhuang Areas in the GuiYijun Period Chen Yuzhu(76)

Abstract: Five Surnames written in Tibetan in Dunhuang areas is a divine book adapted from the Chinese text Zhajing and is mainly used by Tibetan immigrants in the GuiYijun period. This book is a strong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ibetan immigrants have utilized Chinese surnames in Dunhuang areas. Five Surnames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ribal history about Tibetan immigrants who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culture in local order for enhancing the social status and acquiring approval.

Keywords: text in Dunhuang areas; Five Surnames ; GuiYijun period; Tibetan immigrant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erm "so blon" in Ancient Tibetan in "the Account of Nanman" of New Tang History Yang Ming(85)

Abstract: The researchers could not explained the record about Su- Lun, an officer title of the Tubo, in "the Account of Nanman" of New Tang History and "the Section of Foreign Peoples" of Ce- Fu- Yuan- Gui (literally, Emperor's Book House and Huge Turtle) before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e word "sovi blon pos" in the inscription of the Tang - Tubo Alliance Monument and "so blon sde lnga" in the Biography of Zanpu (Tibetan King) in ancient Tibetan language found in Dunhuang areas. Some researchers interpreted "sovi blon pos" as borderland general or officer. And "so blon sde lnga" means five sections of borderland officers. So, the transliteration of Su- Lun in the Han language is "so blon" in Tibetan language which was a special title for the borderland officers.

Keywords: Tubo; so blon; borderland officer.

A Comment on the Study about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Yuan E(91)

Abstract: The study about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s for the academic circle. The paper reviews the study about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basis of it, points out that summing up the mechanism and rule of the change of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of personal identity, connecting personal or group's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with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studying ethnic questions from the view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vicissitude are good approaches that serve for the society.

Keywords: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personal identity; social order.

A Brief Report about the Academic Forum on the Practice of the Ethnic Affairs and Policy of Ethnic Minor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 Xing(104)

A Brief Report about the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Method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Practice in China Yang Zenghui and Peng Yongqing(106)